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 行为取向分析

——基于传统政治文化视角

彭觉勇◎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分析

——基于传统政治文化视角

彭觉勇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当前,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然而,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规划现象、城市问题,这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都没面临过的问题。显然,西方城市理论与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之间存在较深的裂痕。只有把“在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转变为“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才能正确指导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和适应实际的需要,故推动城市规划理论的本土化十分必要。

本书确定了城乡规划学、政治学和传统文化相交叉的研究方法,以传统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以城市规划过程(规划政策制定阶段、规划实施阶段)作为研究主线,以四大基本参与主体(政府部门、规划咨询机构、利益集团、市民)在规划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行为后果(规划现象)为依据,对四大主体行为产生的取向原因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本书也为城市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本书适合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人士、城市规划从业工作者、高校规划专业学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分析:基于传统政治文化视角/彭觉勇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641-5751-7

I. ①规… II. ①彭… III. ①城市规划—研究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7593 号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分析——基于传统政治文化视角

著 者 彭觉勇
责任编辑 宋华莉
编辑邮箱 52145104@qq.com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5751-7
定 价 4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序 言

(一)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正日益改变着我国的城乡空间面貌,展示着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繁荣和行业的兴旺。但是,在对城市规划活动本质的认识上,各类从业人员还存在诸多差异。笔者在与规划从业人员或政府规划管理人员进行交流时发现,他们对规划现象的理解带有较多的“技术理性”特点;在与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人员交流时发现,他们对规划现象的理解却带有较多“理想主义”特点。对城市规划活动本质理解的差异产生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规划从业人员认为规划理论“不值一钱”,而规划理论研究人员认为规划从业人员“不可理喻”。这种现象凸显了城市规划理论的某些尴尬,即中国当前的部分城市规划理论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实际并不吻合。看来,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具有裂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弥合这些裂痕,将城市规划理论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当前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多数人将城市规划本质特征看作是对城市空间和土地进行安排的一项技术。这种强调“实用主义”的论断,可能来自于当前的一个普遍心态,那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我们习惯于将城市建设水平的衡量标准物质化,常常以城市的发展规模、占地面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人口数量、城市建设投入等要素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指标。但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是多么的“片面”。如果说城市规划仅仅是一项对城市空间和土地进行安排的技术,那么这种论断很显然无法回答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具体问题:①谁来进行城市空间和土地安排?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城市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问题,即城市规划的参与主体是谁。②参与主体凭什么来进行城市空间和土地安排?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权力问题,这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③参与主体怎样安排空间和土地?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城市规划参与主体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④参与主体对空间和土地安排的程序是如何进行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城市规划过程阶段的设置问题,需要以过程的思维观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对城市规划理论

的逻辑思辨,而是上述内容的确会对城市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基于这些粗略的分析很快就会发现,把“工程技术”作为城市规划的本质属性确实不够全面。实际上,城市规划的工程技术特性更多是表现在城市规划方案的编制阶段,而城市规划方案编制仅仅是城市规划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目的在于为城市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工程技术理性”不足以全面、客观地表征城市规划过程的本质属性。以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属性来表征整体过程的属性,既不客观也不全面。笔者厘清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说明本书的研究并没有沿着规划工程技术的常规路线进行,而是从更为宽阔的领域去探索城市规划现象的本质特征,这是对规划本体理论的一次探索。

(二)

城市规划是政府及其相关参与主体,利用公共权威为实现某种特定的城市发展目标而进行的行动安排,涉及全体市民的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由政府、规划(咨询)机构、利益集团(开发商)和市民等多个主体参与,保障落实规划政策的基础是权力,开展规划活动是为了实现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些特征足以说明,城市规划活动是一项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具有公共政策的意味。城市规划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属性,是本书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基础。

城市规划活动总是开端于某项社会问题,或是为了城市扩展的需要,或是为了改善城市空间环境的需要,或是为了满足某些城市建设意愿需要等。继而围绕这些问题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后对政策方案内容实施和落实。这些规划事件的发生具有先后的逻辑关系,即总是存在开始、发展和结束等阶段,进而说明城市规划活动的开展是一个过程。沿城市规划活动的过程进行探索,是本书研究遵循的逻辑主线。

在实践和观察中我们发现,城市规划活动是一项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人的意识活动及由意识控制下的行为,是城市规划活动得以开展最基本的要素。意识,即价值取向;人的行为,即参与主体的行为。可以说,城市规划活动中的城市规划现象,就是参与主体在自身价值取向的支配下,各参与主体行为的集合。价值取向驱动参与主体行为,行为结果产生规划现象,这就是城市规划活动中价值取向、行为及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这个逻辑关系来看,价值取向是城市规划活动开展起点,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内容。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生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政治文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故传统政治文化可以作为分析城市规划行为取向的视角。

总之,城市规划活动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性,即城市规划活动是一项公共政策活动,是一个过程,是参与主体行为取向作用的结果。本书正是将城市规划看做一

个公共政策过程,并以城市规划现象为导向,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认识规划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

(三)

从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方法上看,城市规划活动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实证的”是指事实是怎样的,关注的是事实的“实然”部分,可以通过经验或观察的方法来检验真伪,这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规范的”是指应当怎样,通常通过逻辑推理完成,关注的是“应然”内容,更多的带有主观价值判断,这是人文社科研究开展的基础。从研究对象来看,本书是以城市规划现象为导向,侧重于对城市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进行分析。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规范的”一面,即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去寻找价值取向与行为现象之间的联系。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当前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价值取向,一定是对既有的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取向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价值取向,是当前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的价值取向即传统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即民族的,当前的行为取向即现代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本书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传统的——民族的——现代的逻辑维度,为“在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向“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的转化的探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即对城市规划理论的本土化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我们当前正面临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全球化进程对我国城市规划参与主体行为取向会产生重要影响。面对这个问题,笔者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诚然,由于知识能力有限、经验积累不够,本书的研究还有很多不完善,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但笔者相信,本书的研究已经对西方学理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应该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研究方向。

彭觉勇

2015年5月

前 言

笔者博士毕业后就职于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工作,在此期间,参与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工作,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大量城市规划现象,并发现在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中,对部分城市规划现象关注还较少。由此,笔者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希望对自己在规划过程中所接触的规划现象开展初步研究。

如何串联这些复杂的规划现象进行系统研究,这是笔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通过借鉴政治学理论和研究发现,尽管规划现象纷繁复杂,但这些现象始终会围绕一条主线发生,这就是城市规划过程。也就是说,一切规划现象都会发生在规划政策制定过程和规划实施过程中。同时也可发现,城市规划具有浓郁的政治属性。研究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象发生的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任何城市规划现象都是参与主体行为的集合,规划现象只不过是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的具体结果。由此,笔者通过梳理发现,四类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具有普遍性,即政府部门、规划咨询机构、利益集团(开发商)和市民等四大主体在规划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他们是推动规划过程顺利开展最基本的力量。通过这一现象也可发现为各个参与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平台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本质特征。研究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各参与主体在规划过程中各种行为产生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因此,在研究具有浓郁政治属性的城市规划活动中,可以以传统政治文化为视角;对参与主体的行为产生的源头(即取向)进行剖析。由此,笔者建立了研究认识的全部框架和研究内容。

笔者对城市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取向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发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中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几乎为空白。笔者认为,不同参与主体对城市规

划过程中利益的追求,实际上受到了民族个性的深刻影响。因此,研究规划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是认识中国城市规划现象的关键,这也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内容。本书大部分源自笔者的博士论文,并融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

本书编写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致力于推动城市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二是尝试将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作为认识中国城市规划现象的一个突破点;三是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研究。

由于知识水平与时间关系,研究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肯请读者批评指正,为谢!

彭觉勇

2015年5月

目 录

1 绪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1.1 规划理论“重物轻人”	2
1.1.2 忽略过程公平透明	5
1.1.3 西方规划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7
1.1.4 中国规划理论面临新的创新环境	11
1.2 问题的提出	13
1.2.1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需要进行变革	13
1.2.2 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是理论变革的关键	14
1.2.3 “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研究开展的重要切入点	15
1.2.4 问题的提出	16
1.3 释题	19
1.4 研究意义	23
1.5 研究内容	28
1.6 研究方法	29
1.6.1 研究的思维模式	29
1.6.2 具体的研究方法	30
1.7 研究框架	32
2 基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政治学理论	34
2.1 本书需要借鉴的政治学理论	34
2.1.1 为什么要借鉴政治学理论	35
2.1.2 需要借鉴哪些政治学理论	37
2.2 政治学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41
2.2.1 西方政治学发展历程	41

2.2.2	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	45
2.2.3	政治学与城市规划理论的对比分析	47
2.3	政治文化学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49
2.3.1	政治文化学的研究进展	49
2.3.2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成果	55
3	规划过程的政治属性分析	59
3.1	国外城市规划政治属性的相关研究	59
3.1.1	20世纪60年代以前城市规划理论的政治属性研究	59
3.1.2	小结一	65
3.1.3	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规划理论的政治属性研究	66
3.1.4	小结二	71
3.2	国内城市规划政治属性的相关研究	72
3.2.1	相关研究成果介绍	72
3.2.2	小结三	83
4	规划过程与参与主体	85
4.1	规划过程分析	85
4.1.1	规划过程需要解决的主题	85
4.1.2	规划过程的组成阶段	89
4.1.3	规划过程特征分析	91
4.1.4	规划过程的“两段式”划分	92
4.1.5	规划现象是构成规划过程最基层的细胞	93
4.2	规划过程的参与主体	93
4.2.1	人与城市规划	94
4.2.2	人在参与规划过程中的存在状态	98
4.2.3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类型	105
4.3	小结	107
5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与取向	109
5.1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	109
5.1.1	行为的内涵	109
5.1.2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及表现方式	112

5.2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	120
5.2.1 行为取向的内涵	120
5.2.2 行为取向的产生	123
5.2.3 人类的行为取向由社会化作用产生	125
5.2.4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	127
5.3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与取向之间的关系	128
5.3.1 取向主导行为	129
5.3.2 行为反映取向	129
5.3.3 文化是行为和取向的共同内核	129
5.4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的取向如何影响行为	130
5.4.1 行为取向为参与主体行为提供动机	130
5.4.2 规划目标是全体参与主体共同的行为取向	130
5.4.3 规划目标是参与主体共同追逐的理想	131
5.4.4 行为取向形成的文化塑造着人类的行为	131
5.5 小结	131
6 传统政治文化作为分析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视角	133
6.1 传统政治文化与规划过程	133
6.1.1 传统政治文化塑造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	133
6.1.2 传统政治文化如何影响规划结果	134
6.2 传统政治文化使规划过程表现出民族性	137
6.2.1 传统政治文化使本民族参与主体的行为呈现出共性	137
6.2.2 传统政治文化稳定而又持久地影响本民族的行为取向	138
6.2.3 传统政治文化使各民族对城市的未来产生不同的期待	138
6.3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差异比较及对规划的影响	139
6.3.1 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环境是规划理论产生的土壤	139
6.3.2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对规划过程产生的影响	140
6.4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规划过程	141
6.4.1 被传统政治文化渗透的中国人	141
6.4.2 传统政治文化对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影响	142
6.5 传统政治文化作为分析视角的框架	144
6.5.1 概念结构	144
6.5.2 参照系	145

6.5.3 传统政治文化视角	145
7 规划政策制定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分析	149
7.1 规划过程的两个阶段	149
7.1.1 规划政策制定阶段	150
7.1.2 规划政策实施阶段	151
7.2 规划政策制定阶段	151
7.2.1 问题的提出与筛选	151
7.2.2 确定规划目标	155
7.2.3 规划方案编制	156
7.2.4 选定规划方案	158
7.2.5 政策制定过程的反馈	159
7.3 规划过程政策制定阶段四大参与主体的行为	159
7.3.1 政府部门的参与行为	159
7.3.2 规划(咨询)机构的参与行为	161
7.3.3 利益集团(开发商)的参与行为	162
7.3.4 市民的参与行为	165
7.4 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规划政策制定过程	166
7.4.1 伦理价值观念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轴	166
7.4.2 价值取向选择是规划政策制定的基础	167
7.4.3 价值取向决定着规划政策制定的权力分配	168
7.5 政府部门行为取向与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68
7.5.1 规划问题提出环节政府部门的的行为取向	169
7.5.2 规划目标确定环节政府部门的的行为取向	173
7.5.3 规划方案设计环节政府部门的的行为取向	178
7.5.4 规划方案选定环节政府部门的的行为取向	180
7.5.5 规划政策制定反馈环节政府部门的的行为取向	182
7.6 规划(咨询)机构行为取向与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84
7.6.1 规划问题提出环节规划机构的行为取向	185
7.6.2 目标确定环节规划机构的行为取向	185
7.6.3 规划方案设计环节规划机构的行为取向	186
7.6.4 规划方案选择环节规划机构的行为取向	186
7.6.5 决策反馈环节规划机构的行为取向	187

7.6.6 规划机构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88
7.7 利益集团行为取向与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91
7.7.1 利益集团在规划政策制定阶段的行为取向	192
7.7.2 利益集团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94
7.8 市民行为取向与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96
7.8.1 市民在规划政策制定阶段的行为取向	197
7.8.2 市民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198
8 规划政策实施过程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分析	200
8.1 规划政策实施过程	200
8.1.1 规划政策实施是规划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
8.1.2 规划政策实施过程的三个组成环节	202
8.1.3 规划政策实施的解释环节	202
8.1.4 规划政策实施的组织环节	203
8.1.5 规划政策的实施环节	204
8.2 政府部门的行为取向及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205
8.2.1 规划政策实施解释环节的行为取向	205
8.2.2 规划政策实施组织阶段的行为取向	207
8.2.3 规划政策实施环节的行为取向	208
8.2.4 政府部门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理解	209
8.3 规划(咨询)机构的行为取向及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210
8.3.1 规划(咨询)机构的行为取向	210
8.3.2 规划机构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理解	211
8.4 利益集团的行为取向及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212
8.4.1 利益集团的行为取向	212
8.4.2 利益集团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214
8.4 市民的行为取向及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215
8.5.1 市民在规划政策实施阶段的参与行为	215
8.5.2 市民行为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理解	216
9 全球化语境及应对策略思考	218
9.1 规划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全球化语境	218
9.1.1 政府部门行为取向发生的变化	220

9.1.2	规划机构行为取向发生的变化	220
9.1.3	利益集团行为取向发生的变化	221
9.1.4	市民行为取向发生的变化	221
9.2	如何融入全球化	222
9.2.1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变”	222
9.2.2	规划过程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的“不变”	223
10	结论和展望	225
10.1	本书的主要结论	225
10.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29
	后记	232
	读书期间发表的论文	234
	参考文献	235

1 绪 论

1.1 选题背景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的规划理论仍然是指导我国规划实践的主要理论。城市规划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与具体的城市综合环境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实际。对于城市规划理论,笔者认为影响其形成的综合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表 1-1):一是,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习俗等综合因素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紧密相关,并且这些要素

表 1-1 影响城市规划理论形成的各种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内容	对规划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
政治制度	权力构成、制度设计、土地归属、执政目标等	1. 规划目标设定;2. 规划过程制度设计;3. 参与主体类别; 4. 规划过程如何进行;5. 规划为谁服务等
经济情况	经济收入情况、社会财富分配情况等	1. 规划目标设定;2. 土地性质划定;3. 基础设施配置情况; 4. 容积率等;5. 城市发展规模;6. 城市功能设置;7. 城市体系设置等
社会状况	社会群体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等	1. 规划目标设置;2. 基础设施配置;3. 规划内容选择; 4. 规划过程参与情况等
文化习俗	历史情况、文脉场所、生活习俗等	1. 城市特色;2. 城市空间肌理;3. 历史遗产空间保护等
物质环境	地貌、水文、生态、气候、区位等	1. 城市空间形态;2. 城市空间特色;3. 城市设计内容; 4. 城市景观风貌;5. 城市交通组织;6. 城市环境容量等
技术手段	交通组织、通信方法、规划成果展示技术等	1. 城市空间形态;2. 城市功能设置;3. 城市交通组织方式; 4. 规划政策宣传;5. 规划成果展示等
参与主体	参与主体的类型、数量、特点等	1. 规划成果的科学性;2. 规划成果的权威性;3. 规划成果的合法性; 4. 规划过程的制度设计;5. 规划实施情况监督等
价值取向	参与主体的行为取向	1. 规划成果的公正性;2. 规划成果的接受程度;3. 规划过程的参与情况; 4. 规划政策的制定情况;5. 规划方案的实施情况等

是城市规划理论生成的土壤;二是,城市空间不断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需要、新的特点,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城市规划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对这些新时代需要作出正面回应;三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除了在功能定位、土地利用、市政配套和公共设施等方面具有共性外,还可能在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城市风貌、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城市规划理论必须要正视这些差异性。

城市规划理论一旦忽略了对这些综合环境因素的考量,就会导致理论与实际建设脱节,进而影响城市的良性、健康发展。对于当前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城市建设实践来说,两者之间的脱节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1 规划理论“重物轻人”

“重物轻人”思想仍然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主要价值理念。20 世纪初到 60 年代,受《雅典宪章》的深刻影响,理性功能主义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理论的主流思潮,其产生过程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后期,土地使用混乱、交通拥挤、公共配套不足和居住环境较差等现象成为当时城市空间最突出的问题,这严重制约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统治阶级的地位。在此背景之下,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于 1933 年召开了主题为“功能城市”的第四次会议,形成了对城市规划领域影响深远的《雅典宪章》。《雅典宪章》遵循理性主义哲学^①,强调认知事物“分解思维”的模式,即通过“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无限小的部分予以分别认识,然后再按照一定的秩序组装在一起以实现对总体的把握”^②。在此基础上,《雅典宪章》提出将城市空间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等四项功能区域,以实现城市的良性发展,这一思想也成为该时段指导城市规划的大纲。面对工业革命后期出现的上述城市问题,理想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模式,使城市能适应其广大居民在生理上及心理上最基本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度强调纯粹功能分区,也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产生了较多问题。“十次小组”(Team 10)曾经这样批评:“这是一种高尚的、文雅的、诗意的、有纪律的、机械环境的机械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严格等级的技术社会的优美社会。”纯粹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城市的各个部分成为简单的机械组合,缺乏对城市进行系统的综合考虑,导致城市空间生活单调和空洞,缺乏应有的活力和生机。

① 这一思想来自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物笛卡儿,在他的名著《方法谈》中提出了理性思维方法的规则,其中的两条是:“将我们考察的每一个困难分析至尽可能多的部分”,然后根据这种分析,“以从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直到最复杂的认识”。

②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208.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城市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也促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雅典宪章》所倡导的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简·雅各布斯在面对《雅典宪章》倡导的城市理想功能时说过,“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使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①。面对上述问题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对城市规划的理解逐渐从“功能秩序”转变为“系统综合”。1977年,在秘鲁签署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ACHU PICCHU),这是对传统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重大突破。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制定者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这改变了《雅典宪章》所强调的描绘终极状态,强化了对城市规划连续的、动态的特性认识。同时,《马丘比丘宪章》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类人群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这奠定了社会文化论的方法论思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方法和思想部分进入我国。受当时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在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里,我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基本都是吸收苏联的理论和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体制和经济发生巨大变革,西方部分新的规划思想和方法也进入我国。然而,“社会经济低水平下的包括初期工业化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董鉴泓,1989)仍然位居主体地位。我们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并快速应用于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际,而对其真正的精华和内涵缺少应有的研究。

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高速的城市化水平是建立在落后的国情之上的。因此,改变城市现状就成为社会全体人员的共识,迅速使城市“脱贫致富”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口号。《雅典宪章》所倡导的城市规划思想能很好地适应这些时代需求而大受欢迎,因为在理性功能主义的指导下,城市能较快地形成一个具有功能分区严格、空间秩序良好、土地使用严谨的城市空间环境。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物质空间决定论”和“技术至上”成为规划城市蓝图的基本价值法则,物质空间规划思想成为了城市发展思想的主宰。在快速改变落后城市面貌的呼声中,政府、规划师和公众乐意看见一个全新的城市环境,规划师们、建筑师们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大显身手。因此,一方面市长们对城市宏伟蓝图的行政要求不绝于耳;另一方面,规划师和建筑师可以在城市规划方案蓝图上“信手涂鸦”。于是,宽阔笔直的大道成为城市的主要线条,而拥堵的交通却让人们负重难行;耸立的擎天大厦成为城市耀眼

^① J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